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文學覺醒的百年之路——東漢中後期創作活動與文學意識
演變之考察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2-068-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吳旻旻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31 日

國科會計畫結案報告

計畫名稱：文學覺醒的百年之路——東漢中後期創作活動與文學意識演變之考察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2-068

計畫主持人：吳旻旻

執行期限：2004.08.01 至 2005.07.31

壹、 中文摘要

本計畫考察東漢賦作及相關史料文獻，企圖釐清文學意識由漢世之混沌跨入魏晉之明晰間的完整發展歷程，其中創作表現手法之試煉較早，約自劉歆〈遂初賦〉便出現情景交融典型，張衡時〈思玄〉承先、〈歸田〉啟後，審美取向開始轉折，整個過程之中《楚辭》的諭示功能值得玩味。至於文學環境的變遷，主要體現在文士創作心理、預期讀者的改變，其中文士的交遊與群體的分化是重要關鍵。唯有賴於東漢中後期百年之間文學環境、創作活動之重要變化，鄴下文學集團方能臻於高峰，蛹蛻出慷慨氣象。

關鍵詞：文學自覺、漢賦、東漢

貳、 緣由與目的

關於中國「文學自覺」的肇始，自鈴木虎雄、魯迅不約而同地歸於建安時期之後，建安時期代表文學覺醒幾成定論。誠然，「建安時期」位居中國文學史上變化轉折的關鍵時期，就文學創作而言，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所作詩、賦抒情性濃厚，曹植並自言「雅好慷慨」，因此建安文學代表著文學正式用以抒寫性靈；就文學理論而言，曹丕於《典論·論文》中倡言「詩賦欲麗」、「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明白揭示文學之特質，並肯定文學具有崇高價值，不再被視為類比倡優博弈或童子雕蟲篆刻者；是以建安之後，文學從道德教化中解放出來，毋須依傍仁義諷喻而有獨立價值，成為士人宣洩情志、消愁解悶、表現才華的藝術途徑，創作活動也不再是「快主上之意」的獻賦誦讀，取而代之的是以友朋為寫作對象的書信往返或詩作贈答，這樣的文學觀與文學創作型態影響中國古典文學極為深遠，因此建安時期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問題是：這些重大演變難道是建安時期一夕發生的嗎？

在提出計畫之初，計畫主持人即已觀察到東漢中後期的文學觀念、文學環境與文學創作三方面似乎均處於轉折變化的階段。就文學觀念來說，先秦至兩漢時期「文學」之義約在於廣義的「學術」或狹義的「經學」之間擺盪，共同指向可以飽滿涵養、端正身行、向上進言的古籍知識，並非「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文藝創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後漢書》中「文學」一詞出現的次數明顯少於《史》、《漢》，反而是「文章」一語使用頻率倍增，如桓譚、應瑒、崔瑗、馬融、延篤等人俱「以文章顯」，所謂的文章包

含詩、賦、頌、銘、箴、誄、弔、書、論、雜文……等種種文字「創作」，排除經傳章句等注釋性文字，或是著重思想義理的子學著作，更不是《史》、《漢》中「制度文章」「文章五色」的意涵，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不帶實用目的、不為學術性質而講究美感的獨立「文學」概念在東漢時已逐步萌芽。就文學環境而言，東漢中期，士族逐漸興起，同時政治上外戚、宦官交替把政，皇帝往往是孩提，使得君臣之間難有深刻的理解與互動，從宋玉、司馬相如到班固那種獻賦諷諫模式土崩瓦解，文學創作者無法再期望年僅數歲，乃至數月大的皇帝能欣賞理解自己苦心孤詣創作出來的作品，於是文士創作時的預設讀者逐漸轉移。文學創作方面，張衡〈歸田賦〉開始，賦體發生變化，由苑獵京都大賦轉向抒情小賦；此外，後世奉為抒情經典之〈古詩十九首〉亦成於東漢後期，其詩溫麗悲遠，含蓄不盡，毫不亞於魏、晉乃至唐、宋詩作。

換言之，在建安之前，倘若沒有此一「文學／文章」的概念分離過程，沒有獻賦諷諫模式的瓦解，沒有這些有名無名文人對抒情詩賦的嘗試，鄴下君臣文學成就的高度與深度未必能如此出色。職是之故，本計畫以「文學覺醒的百年之路——東漢中後期創作活動與文學意識演變之考察」為題，擬考察東漢殤帝——東漢第一位幼齡皇帝——即位起（西元 105 年），下至曹丕代漢（西元 220 年）之間創作活動與文學意識的演變。

參、 結果與討論

「文學自覺」的問題自 1919 年鈴木虎雄先生在日本《藝文》雜誌上明確指出「魏的時代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以及 1927 年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篇著名講稿中提出：「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根據魯迅原文的粗略說明可以知道，其「文學的自覺」乃是指「詩賦不必寓教訓」，「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此共識大約維持了 60 年，直至 1996 年，張少康〈論文學的獨立和自覺非自魏晉始〉不同意魯迅先生所提出的說法，認為從文學觀念的發展演進、專業文人創作的出現和專業文人隊伍的形成、多種文學體裁在漢代的發展和成熟、漢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的特點等方面來看，文學的獨立和自覺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它從戰國後期開始初露端倪，到西漢中期已經相當明確，這個過程的完成可以劉向對圖書的分類作為基本標志。（《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6-2）劉躍進《門閥世族與永明文學》則主張以文學獨立一科、文筆的辨析、四聲的發現三方面為顯著標誌，中國古代文學從此真正步入自覺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96 年，頁 22）之後「魏晉說、西漢說、宋齊說」吸引多位學者加入討論，如李文初便以連續三篇論文辯駁西漢說及宋齊說。

這些爭論往往因各家對「文學定義」及「文學自覺的指標」認知不同而陷入各說各話的困境，尤其許多彙整性的論文往往就表面現象來評論，未針對具體的史料與文本進行深入分析。為此，計畫執行這一年期間，主持人以精讀《後漢書》和《全漢賦》、《全漢文》為主，希望得出來的成果不是一個「某某說」的標籤，而是對整個文學歷史的發展更細膩的體會。

在閱讀與思考之後，主持人做了些許的調整，其一是排除詩歌，只就賦體進行探討與論述，其主要理由是就漢代文獻看來，「古詩十九首」等無名詩人作品在當時並未被正視，文學的主流除「賦」無他；且「古詩十九首」代表「創作抒情化」的趨勢，此乃文學常識，無論是否將之作為佐證納入論述，對本計畫之學術價值並未有顯著差別，不如專力於少人閱讀的漢賦，進行更深密的考察。其二，史料的探索與文本的分析在方法與角度上略有歧異，因此主持人初步將研究成果分為兩個部分：(一)漢賦之抒情及藝術覺醒(二)東漢創作環境的變遷，各自寫成單篇學術論文，其中前者已寫成〈漢中葉賦家對《楚辭》喻託手法的詮釋與應用〉(約一萬五千字)，將於94年11月26、27日在輔仁大學所舉辦之「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後者目前仍在撰寫中，擬近期投稿於國內重要學術刊物。以下即就這兩部分研究成果簡要說明如下。

(一) 漢賦之抒情及藝術覺醒

一般文學史或賦史通常將體物大賦到抒情小賦的轉折點標舉為張衡〈歸田賦〉，如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以此賦與上林、蜀都等賦相比，可見兩漢散文賦轉變之跡，篇幅由長篇巨製變為短小篇章，內容由詠宮殿游獵京都等事物變為個人之胸懷與理想，作風由堆砌誇飾鋪采摛文變為平淺自然清麗可誦，句法由散行變為對偶，魏晉之賦大致循此路線發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年，頁71)李曰剛《辭賦流變史》亦謂：「張衡實由侈麗閎衍之大賦，過渡而為清新簡麗之小賦，一承前啟後之賦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124)蓋〈歸田賦〉僅二百一十二字，篇幅上確實與〈子虛〉、〈上林〉、〈長楊〉、〈羽獵〉、〈兩都〉、〈二京〉等苑獵京都大賦有明顯的差別，論其篇幅之差距自然無可疑義，然而若謂前此無抒情賦篇則並不允當。

主持人閱讀漢賦之後，以為張衡確實是漢賦演變上的關鍵人物，其〈思玄賦〉總結之前朦朧的藝術手法試驗，〈歸田賦〉則開啟了新的美感特質。但其轉變亦非一蹴可幾，而是自西漢後期逐步覺醒，且《楚辭》在其間扮演了相當重要的「啟發」角色，此須由劉歆〈遂初賦〉說起。〈遂初賦〉是劉歆於哀帝年間徙為五原太守時所作，該賦最大的特色是藉由所經地點帶出大量史事，鄭毓瑜先生〈歸反的回音——地理論述與家國想像〉稱之為「將空間歷史化，首創了因地及史的方式」，而在這趟旅途上重疊的歷歷往事中，劉歆對晉悼公、平公(公元前572-公元前532年)這段由盛而衰的時期著墨特多，暗示著「朝政已多失矣」，並感慨宗室見黜的現實境況，其中不無「賢而見棄」的委屈，然就表現手法來說，劉歆未如一般西漢騷體賦依附在《楚辭》善惡對比的框架之下，而是藉著北行的節候物色變化，在塵沙杳冥、迴風飄忽中，流露作者心境的孤苦。

班彪〈北征賦〉也承繼此種手法，其作賦之時正處兩漢之交，西漢已亡而光武天下未定，他北赴天水歸隗囂，由於「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只好奮袂北征、超跡遠遊，而一路行來，自然及人事景象的蒼涼，讓他不由得一次又一次的止步嘆息，「紛吾去此舊都兮，駢遲遲以曆茲」，「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情緒在「行」的過程中不斷因景物、事件而牽扯，瀰漫於整篇文章；雖然全賦明顯學習《楚辭》的文句結構，但「哀生民之多故」的悲憫情志顯然不同於屈原。所以我們可以說，班彪汲取《楚辭》的藝術特質，將〈離騷〉、〈哀郢〉或虛或實的述行紀遊當成一種純粹的藝術手法與

抒情方式，用來表達自己所關懷的民生疾苦；〈北征賦〉之外，其〈覽海賦〉、〈冀州賦〉也有類似的挪用情形。

東漢中期，最重要的賦家首推張衡（78~139），據《後漢書》本傳，「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賦之內容乃詩人有感現實的孤榮，而端著卜筮、鑽龜觀禎均示意遠行，於是他「將往走乎八荒」，遠遊的經歷包括自然山川、神話世界、歷史人事、宇宙天文……等，最後以道家的無為與儒家的仁義自我惕勵。這樣的自處態度也展現在〈歸田賦〉中，張衡在鋪敘美好的歸居想像之後說：「極般游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誠，將回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仍是迴駕依歸道藝。〈鬪髀賦〉某種程度上也有相似的意義，作者由周遊四方起筆，步馬逍遙間顧見鬪髀，兩人展開一段對話，莊周鬪髀闡述其所認知的生命價值內涵。篇章作法上與〈離騷〉、〈遠遊〉不無相通，同樣是對現實不滿，而藉著幻化的旅遊歷程或是虛設歷史人物發聲的方式來表達主體抒情感受及理念陳述，只是張衡一貫以理性的沈思與安排改寫《楚辭》的激情，重新安頓主體自我的生命價值。

從〈遂初賦〉的情景交融一路下來，漢中葉之騷體賦和《楚辭》建立了另一種藝術手法上的關連性，即使劉歆、班彪、張衡等賦家對自我生命價值的定位俱背離屈原；但是就「抒情」層面來說，他們的憤懣、無奈、以及渴望掙脫現實的情感仍然相近，於是屈原作品產生另一個意義：啟發他們如何為這樣的情感找到相應的形式；之後的趙壹，乃至魏晉時曹氏父子的遊仙詩等，俱可繫屬於此脈絡之下。

（二） 東漢創作環境的變遷

從楚頃襄王羅致能文之士宋玉、景差、唐勒開始，到西漢梁王、武帝、宣帝等，帝王貴族以其財力權勢而廣為招納文士的情形相當普遍，政治權貴附庸風雅，能文之士暇豫侍君，宴會狎遊的場合裡，文士常常應要求而提筆成篇以助雅興，因此文學活動型態均以「貴游文學」為主流，圍繞在君王周圍的作家們各自與君王形成一對一的「說話」情境，作賦的文士為說話者，君王則為其預設的聽話者；至於文士之間很少視彼此為說話對象，如西漢初梁王身邊的枚乘、嚴忌，或是武帝時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嚴助等，現存文獻中幾乎不見他們之間有創作上的互動情形。

東漢之後，整個政治與文學環境逐漸改變，就政治面來說，隨著經學取士，士人數量激增，朝政運作由士大夫、儒生所組成的繁複官僚體系依制度進行，於是各個儒者官宦所分得的政治責任大幅減縮，與皇帝的互動也相對淡化，反而是久居二千石以上的世家，擁有眾多「門生」、「故吏」，逐漸成為壟斷做官權力和操縱統治階級內部輿論的一種強大的力量，形成後來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另外有些知識份子不願受制於世官名儒各個官僚集團，於是堅持在野隱逸，形成「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的特殊風氣。殤帝之

後，外戚、宦官僭奪權柄，利用幼主虛位來干預朝政，脩德絜行的士人自不能坐視，念念要激濁揚清，如張綱即言：「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是以諸儒群起抨擊、奮不顧身，奈何宦官羅致以「欲圖社稷」之罪名，造成桓、靈兩次黨錮之禍，喪生者不計其數。在這樣暗潮洶湧的時代，身為知識份子的創作者，其創作態度勢必有所改變以因應環境巨幅變化。

就文學面來說，東漢中葉開始，文人的創作對象不再是以君王為主（因君王多為幼齡孩童），於是一群相互瞭解的朋友轉為主要的傾聽者，尤其是學養相近的士族成員，彼此相互理解而能適當回應，如張衡與崔瑗、馬融等人相友好，時相討論學術或文藝問題，最後崔瑗並為張衡作〈河間相張平子碑〉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顯現交情與相知之深。蔡邕〈與袁公書〉也記載：「朝夕遊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魚，欣欣焉樂在其中矣！」

另一方面，桓、靈期間除了黨錮之禍外，仍有更多細節值得討論，王力堅〈自我的覺醒與文學的自覺〉表示：東漢後期，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朝政黑暗，誅戮交加，戰亂頻繁，疫癘並生。漢帝國無可奈何地走向季世窮途，至高無上的君權受到極大的沖擊。文人們的帝國夢破滅了，他們的目光也就自然而然地轉向個人自我，個體意識得到喚醒，自我價值得到重視，面對死神暴虐性命如蟻的殘酷現實，他們更驚駭地意識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因此，他們的自我發現、自我覺醒，並沒有表現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掙脫宗教神權而覺醒的那種科學理性光輝，而是一種優生懼死、依戀人生的凝重淒涼的自然生命意識。（《學術交流》1995-4）黨錮之禍對士人最根本的打擊就在於粗暴地擠壓了士人精神的及現實的生存空間，由此導致的直接結果是：士大夫逐漸疏離政治，由對外在價值的強烈追求轉向自我天地；清議也由品鑒人倫、議論政治轉向評論容顏及形而上的清談。剖析東漢文化及士人的心路歷程，可以發現，中國文學的自覺是以士林分化為大前提，又以俗士階層的湧現和時人對世俗情懷的認同為契機，而以黨人精神的失落和俗士們的痛苦彷徨為代價的。而這種失落又於無意間拯救了詩性精神，促進了文學的自覺。

在這一變革過程中，漢靈帝是一位值得留意的人物，他創置「鴻都門學」，大力招攬才藝之士，並以此授任官職，大幅提高了文士的社會地位，雖然這些鴻都文士多來自寒門，仕途上受到儒學世族的排斥，雙方產生激烈政爭，鴻都文士遂與閹宦結盟，因此鴻都文士對於漢末文學發展究竟有無正面貢獻，學界有不同意見。然而，即使鴻都文士中並未出現重要作家，可是當時世族與寒門的分化對立卻促進各自強化社群意識，循此而下，魏晉南朝相繼出現了為數眾多的文人社團和文學流派，造就中古時期異彩紛呈的文學盛況。

肆、 成果自評

一、「文學自覺」的論題雖非創新，然東漢至魏乃學術史成說之模糊地帶，本計畫透過確實的考察，試圖證明由漢至魏晉六朝文學演變的漸進歷程，信有補益之

功。

- 二、漢賦文辭古奧、典故繁多，且歷代箋註甚寡，閱讀上耗時費心，一向少人願意從事，主持人一步一腳印，細細讀來，受益甚多，除本計畫之直接成果，亦陸續抉發新課題。
- 三、在漢末文學現象中，一般論者只注意趙壹、蔡邕等作家以及黨錮等明顯現象，本計畫亦留心馬融、李固、胡廣等文人及鴻都學門等具體細節，所得觀察當更加縝密堅實。
- 四、關於東漢文學創作環境之變遷，上述現象是目前觀察所得，論述架構仍未完全，未來待正式論文發表時將更具體系。
- 五、限於思力與時間，文學創作及環境兩因素尚未整合完成，如能持續思考，將勾勒出完整之文學發展圖像，建構系統性之論述，進而提出可資應用的「詮釋典範」。